



羊皮浮筒(红军东征纪念馆藏)

1936年2月,黄河尚未解冻,冰凌如刀,寒风刺骨。就在这天险横亘的陕晋交界处,一支红军队伍悄然集结于陕西省榆林清涧县沟口村。他们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,肩负东征山西、开赴抗日前线的使命。面对湍急冰冷的黄河,没有船,没有桥,红军依靠的是一种特殊的“船只”——羊皮浮筒。

羊皮浮筒是晋陕黄河沿岸百姓千百年来渡河的工具。其做法是取整张羊皮,经硝盐鞣制后吹气封口,便成一只鼓胀结实的气囊。单个使用时,战士将其系于腰间或腋下,既可浮水,又便于泅渡;多只并用,则捆扎成筏,载人运物。这种浮筒轻便、易藏、不惧浅滩暗礁,正适合红军渡河。

东征前夕,当地群众纷纷献出家中存皮,有的甚至宰羊取皮支援红军。仅石楼、清涧一带,就征集到羊皮数千张。许多战士从未见过羊皮浮筒,但在老乡手把手指导下,很快掌握了吹皮、密封、绑扎的方法。1936年2月20日夜,红军从沟口、河口等多处同时渡河。战士们或怀抱或腰系羊皮浮筒,顶着冰凌跃入黄河。河水刺骨,浪高水急,但凭借浮筒托举与坚定信念,数千人一夜之间突破布防严密的黄河防线,挺进吕梁山区。

今天,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的红军东征纪念馆内,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静静陈列——那是一只红军东征时期的羊皮浮筒。皮面已呈深褐色,褶皱纵横,局部有修补痕迹,封口处仍可见当年用麻绳反复缠绕的结扣。它曾载着年轻的红军战士穿越惊涛,也曾浸透黄河的泥沙与战火的硝烟。这浮筒上的每一道裂痕,都是历史的刻痕,每一处磨损,都是信仰的印记。

羊皮浮筒虽无言,却诉说着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如何以最朴素的器物,完成最艰巨的使命。90年过去,黄河依旧奔流,而那只浮筒,在纪念馆的灯光下,默默讲述着那个春夜:一群人,怀揣救国之志,用几张羊皮,渡过黄河,走向烽火连天的三晋大地。

羊皮浮筒助红军

艾荣

石桥无言 车辙有痕

顾晨

2026年1月14日,太原城北。一座沉睡数百年的明代石桥,在玻璃幕墙之下醒来,依稀旧岁,勃发英姿。它名为镇远桥,其遗址馆的正式开馆,不是一次寻常的考古成果展示,而是一次城市与历史的重逢;当头顶的解放路高架桥,舒展着现代都市的脉络;当脚下一线南北的地铁,呼啸着时代进步的节拍,位于它们之间的镇远桥遗址,时空穿越,如此遥远又如此趋近,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车马喧嚣。

这座桥,是昔年太原府城北门“镇远门”外护城河上的咽喉要道。如今,它不再连接城门与驿路,而是凝结为固化的言说,以斑驳的石筑与清晰的印痕,连接着过往与当下。

桥从土中来

2017年8月,太原地铁2号线北大街站施工正酣。机器掘进至地下数米时,工人们忽然发现:土层之下,竟横卧着巨大的条石。文物部门迅速介入,一场抢救性发掘由此展开。



镇远桥遗址 顾晨摄

经考证,这是一座明代单孔拱桥,黄砂岩砌筑,残长22米,宽17米,拱高3.5米。桥体结构完整,雁翅驳岸清晰可辨。最令人惊奇的是桥面上几道深深浅浅的车辙——最深处竟达10厘米。历数百年风霜雨雪,基本可以判定,是明清两代无数车轮碾过留下的印记,为晋商驼队、官府驿马、市井贩卒、征战军旅共同踏出的历史痕迹。

镇远桥的构筑,是明初太原城扩建的必然。明洪武三年(1370),朱元璋封第三子朱橚为晋王;明洪武九年(1376),朱橚就藩太原,其岳父平侯谢成奉命拓建太原府城,将原宋城向东、南、北三面铺开,形成周二十四里、高三丈五尺的雄伟城池。八座城门应运而生,北面两门,西为“镇远”,东为“拱极”。

《万历太原府志》有明确记载:“镇远门外桥,北城大北门外。”桥因门而得名,门因桥为通衢。镇远桥,正是镇远门外跨护城河之桥。其名“镇远”,意为“镇守远方”或“使远方安定”,折射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。太原史上即称“九边重镇”,其城防体系在绵延中濡染文化,连一座桥名,都承载着战略意义。

而最初此桥未必是石构。明代太原八门皆设吊桥,多为木质,战时可撤,以阻敌骑。后城市发展,因迎泽门为通南关要道,率先改为石桥。其余诸桥对应,极可能在明代晚期由木易石。今日所见镇远桥的成熟拱券工艺与规整条石,以其事实,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转变。

车辙载往昔

站在遗址馆内的桥边俯视,几道车辙如时间的沟壑,深嵌于石面,这正是数百年前真实的交通流量记录。

车辙,通常由左右两轮形成。深浅不一的印痕,诉说着不同时期、不同线路的兴衰变迁。而眼前的景象说明,镇远桥并非“小桥流水人家”景致,而是城市主干道的一部分,车流密集,路径固定。车辙深勒,足见通行之频繁。

这些车辙,是城市常态生活的有形实录,亦是晋商崛起的无声旁证。明代中后期,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全国,甚至远涉海外。太原作为北部重要商埠和交通枢纽,镇远门正是辐射北方的起点,镇远桥,自门而下而延,成为见证汇通天下的物质承载。

更难得的是,镇远桥保存了完整的桥拱与驳岸结构。券顶距券处高2.27米,半圆券形,券顶稍做拱形造势,称为“锅底券”,多见于明清建筑。桥体在建造时不仅用生铁



镇远桥想象图(AI生成)

打制的锚杆插入桥体内部,还在桥洞平面上用铁十字打造构件,以此来增加拱券结构的强度。另外,桥体两侧还筑有金刚墙,中间用三七灰土夯夯成桥心,结构十分坚固。如今,桥虽残,但形制完整;址虽埋,而故事蕴藉。它或许不像一些久远的遗址,需要想象填补;镇远桥,是以可见的构件与印痕,让过往变得可触、可感、可量、可读。

保护在原址

镇远桥以这样的方式“现身”,于原址的保护与展示,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博理念:宝贵的文化遗产,没有让位于新的城建工程,而是让历史和发展和谐共生。遗址发现于地铁工地,若按旧例,或迁址复建,或仅留资料。但太原此时此际,选择了“原址保护,就地展示”。于是,一座生根原址、复现当年的遗址馆,在解放路北大街口而立。遗址馆采用了恒温恒湿的环境控制系统,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物本体。公众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桥的每一处细节,还不会对其造成丝毫损害。馆内将明代太原府城沿革、镇远桥考古发掘现场照片、复原图及文物线绘图等,一并陈列。文博以新的姿态,讲述一座桥的前世故事,阐释一座城的文化理念。

这种“桥站共生”模式,不追求恢宏,只重视精当,更强调“设身处地”,即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区,为一座石桥,留出了历史呼吸的场域与实地叩问的空间。

镇远桥的意义,已超越一座桥本身。它是数百年前城市建筑的细节;是古代桥梁技术的标本;是晋商贸易路线的物证,是日常生活记忆的锚点。当我们从地铁站走出,抬头是现代都市的霓虹,低头是数百年前的石桥,这种时空交错,这种新旧叠合,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气度与宽博气质的彰显。

石桥无言,城市有心;车辙几道,文明百年。

白瓷窑火映照融合之路

郭悦

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一层的临展厅里,一场名为“北白——白瓷与民族融合”的展览正在进行。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瓷器陈列,而是一段跨越九百年的文化旅程。从北朝窑火初燃,到元代窑火悠长,白瓷如一条纯净丝线,串起中原、草原、西域的工艺与审美,也串起中华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记忆。

白瓷的诞生,源于一场南北对话。北朝时期,北方工匠眼见南方青瓷釉色温润,心生向往,却苦于本地胎土含铁量高,烧出的器物发黄发灰。于是他们尝试用白色化妆土覆盖胎体,反复调整釉料配方,甚至借鉴两次施釉之法。终于,在一次次试错后,洁白的釉面开始浮现。

展厅中一件隋代透影白瓷杯令人屏息。它薄如蛋壳,最薄处仅0.7毫米,对着光,竟能隐约透出指影。这件文物名为透影白瓷杯,年代为隋代,1959年出土于河南省巩县(今巩义市)白河窑遗址附近,现由河南博物院收藏。它标志着白瓷已从“能做”迈向“极致”。更妙的是,这种对轻薄透光追求,对后来宋代定窑、元代邢窑窑影响颇深。

转过一隅,一件辽代白瓷皮囊壶稳稳立于展柜中央。壶身圆鼓,一侧有仿皮革缝合的凸棱,提梁处还做出穿绳的孔眼。这分明是草原民族随身携带的皮水囊,却被定窑匠人用瓷土复刻得惟妙惟肖。这件文物名为白釉皮囊壶,年代为辽代,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一带的辽墓,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,习惯用皮囊盛酒装水;而汉族窑工加以借鉴,将异族生活器物转化为典雅陈设。



左图:透影白瓷杯(河南博物院藏)



右图:白釉皮囊壶(内蒙古博物院藏)

再往深处走,一件元代邢窑窑的螭耳杯引人驻足。杯身素白,一侧附着一个小巧的环形把手。这看似寻常的设计,实则大有来头。中原地区的瓷杯多无柄,而草原民族却惯用金属带柄杯,以便于骑马时单手握持。邢州地处晋南,恰是农耕与游牧交界之地。窑工们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,将金属器的实用结构巧妙移植到瓷器上。于是,一只小小的杯子,成了民族融合的真实证。这件文物名为白釉螭耳杯,年代为元代,出土于山西省晋中市陈村窑址,由山西博物院收藏。

白瓷之白,从来不是单调。它白得包容:能承载佛教塔形的庄严,也能模仿皮囊的粗犷;可作翰林院的贡品,亦可为市井百姓的枕具。它白得坚韧:历经战乱割据,宋、辽、西夏、金各自为政,却共享“尚白”之风;元朝一统,更将白瓷推向全国乃至漠北。这种跨越政权、族群、地域的共同选择,背后是深层的文化认同。



白釉螭耳杯(山西博物院藏)

晋水入纹鉴

邢占平

当一束冷光穿过山西博物院的展柜玻璃,落在这件蟠螭纹鉴的青铜锈色上时,仿佛能听见两千五百年前晋水的回声——那是春秋贵族将清水注入鉴中,看自己的影子在涟漪里碎成星点的声响。

作为春秋时期的青铜水器,蟠螭纹鉴的造型处处透着实用与仪式感的平衡。鉴高50厘米,口径62.5厘米。鉴的口沿宽六折,便于注水或舀水。颈部内收,腹部深阔,下承矮圈足,整体稳重。器身两侧对称设有兽首衔环耳,兽首双目圆睁,衔环可活动。鉴的纹饰繁密。口沿下饰勾连窃曲纹,其下为主纹饰带,为密集的蟠螭纹。蟠螭纹是春秋中晚期流行的装饰纹样,身体似龙,面部似兽,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盘旋缠绕。

鉴是古代的盛水器,有多种用途:可以盛水用于洗浴,也可以盛水用以照面,还可以盛冰用以冰镇食物和酒,即《周礼》中所指的“冰鉴”。它常与匱配合使用,匱用于澆水,鉴用于承接水,共同完成“沃盥之礼”。

这件器物出土于山西侯马市上马墓地。侯马一带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,附近的侯马铸铜遗址曾出土数以万计的陶范,其中就有纹饰极其精密的蟠螭纹范块。春秋时期青铜器铸造普遍采用块范法,而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,当时可能出现了称为“纹饰范片法”的进步工艺,使得精细纹饰能够批量生产。

站在这件蟠螭纹鉴前,仿佛能看见晋水从口沿漫过,听见编钟的余音在纹饰里回荡。它盛过清水,盛过寒冰,盛过一个时代的荣光与动荡,最终成了一面照见历史的镜子。



蟠螭纹鉴(山西博物院藏)



南宋·马远《月下赏梅图》(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)

月下赏梅图

郭冰

《月下赏梅图》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代表作之一,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作品为团扇形制,绢本设色,尺寸约25.1×26.7厘米,创作于13世纪初,是典型的“马一角”构图风格的体现。

画面左侧,山石以斧劈皴法勾勒,轮廓清晰、墨色淡雅,营造出月色笼罩下的朦胧深远感。近景山石坚实有力,与远景的云雾山峦形成空间层次。一株老梅从山石间斜逸而出,枝干虬曲苍劲,梅花疏疏落落,以“以少胜多”的笔法,在清冷中蕴藏生机,仿佛能闻到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幽香。

画面左下方,一位白袍文士坐于山崖之上,姿态悠然,身后立一携琴童子,两人共同凝望前方的梅树与明月,展现出文人雅士远离尘嚣、追求心灵宁静的精神境界。右上方,一轮明月高悬,虽仅一小圆点,却以清辉笼罩全图,将观者带入澄澈清寒的月夜之中。

这幅画不仅描绘了“月下赏梅”的雅致情景,更通过“留白”与“虚实相生”的手法,寄托了画家对隐逸生活与高洁情操的向往。其构图简洁爽朗,笔墨干净利落,是南宋山水小景画的典范之作。



(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)刻有“离石”二字的东汉画像石

千年离石 此石为证

岳娟

近日,考古人员征集到四块东汉画像石,出自同一墓葬。墓主名叫韩元重,是东汉熹平元年(172)离石县寿贵里人。其中一块高116厘米的石柱上,清晰刻有“离石”二字,这是自1919年以来首次在我省吕梁地区汉代实物中发现该地名铭文。

这些画像石用当地砂页岩制成,质地较软,便于雕刻,也利于墨线勾勒和填彩。表面呈红褐色,线条流畅,细节生动。石柱横截面为六

边形,图案包括西王母、车马出行等内容,反映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景象。

“离石”作为地名,在《后汉书》等文献中有记载,但实物长期缺失。这次发现不仅确认了东汉晚期离石的行政归属,也为研究当时人口流动和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关键材料。

这批画像石现藏于吕梁市博物馆。它们融合雕刻与彩绘,风格洗练明快,刚柔相济,是吕梁汉画像石艺术的典型代表。